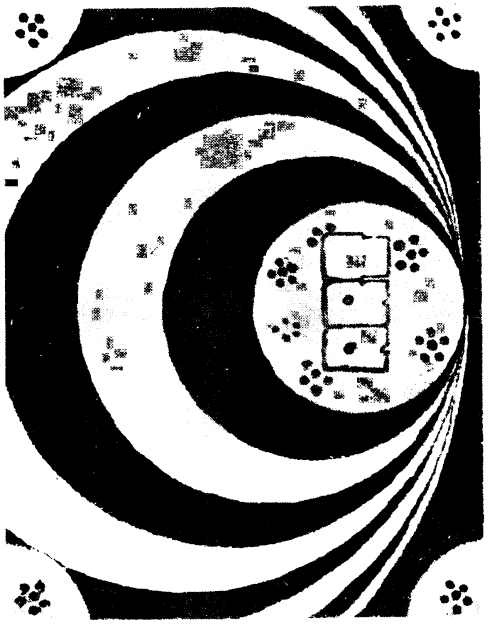
在近期所出版的歷史研究雜誌裏，北京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馬雍教授曾寫一文，題名「近代歐洲漢學家的先驅馬爾蒂尼」，稱衞匡國爲現代歐洲漢學之先鋒。（註八）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最近亦從事他項有關衞匡國的研究。同時，杭州市官方亦邀請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明德研究衞氏之作品，特別是他與杭州有關的著作。衞氏的墳墓在文化大革命時已爲紅衞兵所摧毀，但是衞氏所建蓋的教堂在一九八〇年的聖誕節却重新開放爲禮儀之用。

一九八一年十月，在特利騰城曾召開了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來研討這位中國故友的生平與著作。衞氏不但是一位歷史家、地理家，而且是一個篤實的宗教信徒。兩位來自北京的學者和一位杭州市的代表也出席了這次聚會。深盼藉着對衞匡國的紀念和對其作品的重新探討與出版，有助於促進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友誼和合作。也盼望透過這位偉大的傳教士，中國人民能夠進一步認識基督宗教的眞相。

就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訪馬尼拉時說：「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從一開始就欣賞中國文化，他的榜樣啟廸了許多傳教士。」（註九）衞匡國就是緊隨利氏芳表的一位。縱然誤解曾使歷史蒙汚，但更深的了解可使歷史重新開始。當今教宗也曾如此說：「縱然過去曾有困難，但一切業已過去，現在就讓我們仰瞻未來吧。」相信衞匡國這位歷史學家亦會同意教宗這種積極的看法。

（有關本文附註，請參閱本刊頁五一）



塞外的基督信仰（中）

貝文典著
李國仁譯

土地與人民的概況

在中國，食物與人口的比例從來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九三〇年代早期的一項研究指出，饑餓問題十分普遍。由公元前一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水災、旱災、戰亂及其他災害所造成的饑荒，至少有一千八百二十八宗。

十九世紀末葉正是清代（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晚年，北京中央政府權力式微，已失去了控制邊陲地區的能力。由於中原可耕之地已經不能再容納更多的人口，許多人向外移居。蒙古遂汲收了大量從各處不斷湧進的新定居者。可是，要在蒙古從事耕種是很成問題的。冬天嚴寒，夏天日短，農夫完全要聽天由命。

蒙古居民的耕種方法一向很傳統保守，遇到反覆無常的氣候時，一點應付能力也沒有。春天雪融，夏天傾盆大雨，都會使黃河泛濫成災，連塞外遠遠的地區也蒙受損害。每年水災的威脅，主要是因爲土地上的樹木被砍掉，堤壩一缺，自然會爲許多村落帶來災害。

偶有豐收，貪婪無道的地主却又攫去大部份的收成，使貧農的生活每況愈下。

農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靠的只是家庭間的維繫。這便成了黑社會發展的溫床。一方面，這些黑社會保護其會員；另一方面，却爲難不依從他們的農民。此外，農民還要面對戰爭、土匪搶掠，以及迅速蔓延的疾病的侵襲。

中原的移民很快便制服了蒙古人，並把他們迫遷到長城很遠的蒙古西部。蒙古人分爲許多旗部（即王國），各有不同風俗習慣。遊牧生涯要求他們經常拆除營幕，捲起一切財物，帶同牲畜，遷往新的畜牧區域。

許多蒙古族長往往將土地賣給新湧到的移民，但總是在交易上吃虧，結果，雙方的關係陷於緊張狀態。

最後還要提到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有很濃厚的迷信色彩，由於它是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故成爲蒙古人生活文化的一個重要部份。

正如上期本文所指出，到了一八八四年，內蒙古已經劃分爲三個教區：中蒙、東蒙和西南蒙古代牧區。

西灣子是中蒙傳教區的總部，聚居了一小撮教友，其中有些是第二三代皈依福音信仰的。

傳教方式往往是由一兩位神父在一組農民教友家庭中定居，建一間聖堂或祈禱所，蓋搭神父住屋，然後成立新堂區，而這個新堂區所屬範圍之廣闊，往往需要騎兩三天馬才能抵達。

這種傳揚福音的動力，雖然毫無疑問是一股屬靈的力量，但是亦與許多社會問題連結在一起。當時人民飽遭貧困之苦，常把嬰兒，尤其是女嬰棄置街頭。聖母聖心會會祖南懷仁神父由於早年曾擔任過比利時全國天主教育嬰院的神師，很可能這份職務促使他接受了往中國傳教的召喚，因此，當日每個傳教站的目標之一就是嘗試推行育嬰院。而歐洲教會亦爲此而籌募了許多款項，使這個新興的教會內的每個較大傳教站都擁有一幢建築物，去收容那些沒有人照顧的孩子。

一八八四至一九〇〇年的傳教時期

當日的傳教工作很重視教理培育。在每個傳教站內，特別是在冬天，均逐步設有慕道室，供慕道者學習教理及住宿。

特別要介紹的，就是本地神職人員的培育。一開始，塞外教區每個傳教站（包括遙遠的甘肅省的傳教站）的長上都明白，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培植年輕的國籍修士，使之成爲日後的本地神父和本地團體的領袖。

在中蒙方面，卜天德神父（FR. PETER DE BOECK）的工作最值得提出。他是一位熱心的傳教士，而且比同期的許多傳教士都活得長久。他在西灣子這個龐大的傳教地方任本堂神父多年，同時也是一班修生的院長、總務長和教師。在這個一人負責的聖堂裏，他於十五年內栽培了十多位本地神父。這十多位神父日後對中蒙代牧區的教務發展，給予很大的支持。

在毗鄰的東蒙和西南蒙代牧區，情形也差不多。東蒙代牧區在呂主教（MSGR. RUTJES）的領導下，在松樹咀子設了總部。松樹咀子原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站，位於這代牧區的東邊。該處有一項艱鉅的任務正在等待呂主教、一位國籍神父及四位外籍神父去肩負，因爲該處是一個更偏僻的區城，教友數目既小又散居各處，而他們的傳教方針却要跟西灣子的中蒙代牧區相同。雖然如此，中外神職人員每年都有增加，而且當地居民的經濟情況也比塞外的其他地方優越。因此，它替未來的熱河教區鋪了路，又使巴溝市建起一個新的傳教站。而能夠在巴溝市這個人口較多的城鎮開教，殊非易事，因爲當地的官長設法使大城鎮的人遠離外國人的一切影响。

新成立的西南蒙古代牧區，一般稱爲「鄂爾多斯」代牧區，下迄黃河，遠及寧夏藍牧區。這個代牧區所面對的問題最辣手。「鄂爾多斯」這個名稱已顯示，它是蒙古許多旗部的中心。當選代牧的德主教（MSGR. DE VOS）是第一批與蒙古部族打開交道的傳教士之一。但幾經辛苦，只有城川這一個地方才成了教務蒸蒸日上的傳教中心。

蒙古人的流動性很大，言語不易學習，加上喇嘛教的強烈影响，傳教工作困難重重。爲新到的移民來說，謀求每日生計極端困難，因爲這裏沒有完善的食水供應。故此，教會逐漸捲入基層的社會發展工作中。在往後的數十年內，買地、租地、掘地、建水溝、鑿渠道等建設，陸續出現。漸漸地，移民區和鄉村便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發展起來。

在人口較多的中心區，由於土匪和盜賊善於利用喇嘛教的弱點行竊搶掠，故此，教會除了發展工作外，還要參與建築防衛工作，以便居民遇襲時，有城牆和護城河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爲了求生存，出現了一系列氣象肅殺的堡壘式傳教站。當然，這種防禦工作並非只限於「喬爾多斯」，只不過該處更爲普遍罷了。

最後還要提到，在這個地區內，回教影响力很強，故此，德主教和他的七位傳教同伴要在該區展開傳教工作是一項很艱鉅的任務。況且教授要理、照顧棄嬰、栽培神父，以及其他傳教活動所不能缺少的工作，都已壓在他們的肩上。

雖然傳教工作也曾遇到失敗挫折，但基督徒團體在這塊中國偏僻的土地上畢竟出現了。無論模仿或適應本地情況，都需要努力學習，而傳教方法亦難免有缺點，但對這些處於生死存亡之際的人來說，教會所提供的幫助愈來愈多，使他們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固然，日夕縈繞在塞外傳教士心中的願望，本是拯救人的靈魂和肉體，但由於他們要努力幫助貧困的人，故此更關注肉體的生存。

小結

在這篇短文內，我們無法深入涉及十九世紀末葉的塞外情況。即使拿幾點詳細討論，亦屬走馬看花。

我的目的只是作一個概要的報導，描繪新傳教修會在當地與人民相遇的情形。不掩飾缺失，也考慮傳教士出現的首要任務：救恩的訊息。不過，這訊息不單以天上酬報爲焦點，在許多情況下，亦關心人的基本權利，衣、食、住和合乎人性生存所需。

我們可別忘記體察，與非基督徒交談的名詞或概念當日尚未形成，他們仍舊採用「外教人」和「非外教人」等不雅的稱謂。雖然如此，我們也要立即補充指出，許多傳教士的工作已顯露出教會對非基督徒和本地思想的尊重，從而關心社會。這個傳教修會的熱誠非筆墨所能形容，而傳教士一生的赤誠奉獻亦無庸置疑。他們中大部份人即使明白自己個人能力有限，仍然把「往訓萬民」的傳福音召喚作爲自己生存的指標。（待續）